

佛教的治學經驗和原則

方興

一、介紹幾位大師的治學經驗

(一) 太虛法師的治學經驗

太虛(一八九零—一九四七)浙江崇德縣人，一生辦雜誌、辦佛學院、辦教會、出訪各國。對佛教事業作出貢獻。他的治學經驗：

1. 「我非佛書之研究者」。近代一些研究者如梁啟超、胡適、王恩洋等人，以西方治學經驗來研究佛學，結果認為『楞嚴經』、『起信論』、『梵網經』等書是偽造。太虛大師在『評大乘起信論考證』一文中說：「吾之哀日本人、西洋人治佛學者，喪本逐末，背內合外，愈趨愈遠，愈說愈歧，愈走愈歧，愈鑽愈晦，不圖吾國人乃亦竟拔入此之迷網也。……嗚呼！東西洋之科學、哲學、文學史者，而日本於今日，所謂真正佛學者無一人也。太虛大師反對梁啟超、胡適等人跟在西方人和日本人後面，

亦步亦趨的錯誤主張。發揚我國慎思明辯，探隱索幽的學術經驗，體證佛學的微言大意。

2. 「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」。中國佛教大乘八宗，各有其優勝與不足之處，如果專承一宗，就會只知有一家之言，而無整體佛教的惡果，正確治佛學者，應從釋迦思想的本源，來研究佛學的整體，才能獲得準確和系統的認識。

3. 「無求即身成佛之貪心」。針對一些佛教徒不去認真讀幾本書，而是一味地追求即身成佛，或死後到極樂世界。這種以貪心上求佛道，非但於事無益，結果適得其反。

4. 「為學菩薩發心修行」。菩薩的誓願：法門無量誓願學，菩薩於五明中上求佛道。煩惱無盡誓願斷，即學了知識，要聯繫實際，首先要聯繫自己的言行，堅持真理，修正錯誤。眾生無邊誓願度，其次要聯繫社會實際，如何對國家、社會、人類作出貢

獻。能按上述三條去作，不急功近利，不求成佛，不嚮往極樂世界，則佛道自然成就。

(二) 圓瑛法師的治學經驗

圓瑛（一八七八—一九五三）福建莆田人，十九歲出家，二十歲受具於鼓山湧泉寺。以後在天寧、天童習禪，並從諦閑、通智、祖卽、慧明、道階等人研習教觀。師二十四歲聽「楞嚴經」，乃於佛前發願，終身弘揚斯經，著述講義，用報佛恩。於是苦讀此經達十年之久。於經中疑難之處，逐一書條，貼於壁上。逐條靜坐參究，既明白一條，即扯一條。如是者又經過八年之久，一房疑難，扯盡無餘。六十八歲於上海圓明講堂，創辦楞嚴專家學院，晝講此經，夜編講義，每夜輒至三更乃止，至七十四歲，完成「楞嚴經講義」廿四卷，裝成五冊。師於五十年中，學「楞嚴」，講「楞嚴」，「註楞嚴」，辦楞嚴學院，自稱楞嚴講主，可謂一門深入。

(三) 印順法師的治學經驗

印順浙江海寧人，二十五歲於浙江普陀山福泉禪院依清念和尚出家。受學於太虛大師門下。歷任閩南佛學院、武昌佛學院、漢藏教理院講師。主編「太虛大師全書」。著有「妙雲集」二十四冊。此外還著有「印度之佛教」、「一切有部論師與論書之研究」、「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」、「初期大乘佛教之開展」、「中國禪宗史」。在國內外享有盛名。其治學經驗：

1. 在研究態度上：應有無我的精神，不固執自我成見，不預存一種偏見，不迷信古人，發揮經論的原文。

2. 在立場觀點上：應掌握三法印的原則，顯露佛法純正高潔的理想，才不會走上神化、鬼化的新路。佛法的重點是通過語言的教誡，啟發教育人們向上從善，反對侈談今生後世、神通、靈感之類的怪亂，因為外道也有這些，將佛法安立在這個基礎上，

不是與外道劃等號了嗎？中國佛教重死後重鬼神，太虛大師提出人生佛教來對治。唯有非神化、非鬼化的人間佛教，才是佛法的原義。

3. 在學習方法上，應掌握以下幾點：

① 從論入手：論書條理分明，結構嚴謹。學幾部論書，對奠定佛學基礎是有幫助的。不論大小論書，都要說明流轉的原因何在？知道生死癥結所在，然後對治突破，才能達到寂滅。這種理智型的學習方法，與充滿了宣傳詞句的這個法好，那個法門妙，這個法門成佛快，那個法門了生死快的信仰型的學習方法，有天壤之別。

② 重於大義：對於瑣細的名相，如十八層地獄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等名詞，看過了事，不必強記。研究佛學，要着眼於佛法的整體。如釋尊化世的方法與精神，法的重要理論，制律攝僧的意義，修持的重要方法等重大課題。

③ 着重辨異：以超然的態度去理解不同學說的內容，探求異說的原因。如大眾部與有部對佛身的認識就有分歧。大眾部認為佛的色身、壽命和威力都是沒有邊際的；諸如來語皆轉法輪。佛以一音說一切法，世尊所說無不如義。有部認為：八支正道是正法輪，非如來語，皆為轉法輪。佛非一音說一切法，而是觀機設教。佛自說有不了義經，佛所說法非皆了義（見世友的「異部宗輪論」）。又如唯識經論對唯識變說，重於阿賴耶識種子變說，成為「一能變說」。重於阿賴耶識現行說的，成為「三能變」說。兩說皆淵源於印度。真諦與玄奘所傳，各有所重，何必偏新偏舊，非要「祇此一家」？

④ 重於思維：看書學習，唯有通過思考，才能加深印象認識，如死記硬背，不善思維，即使刻苦讀書，將來寫作，也是東拼西湊，拾人牙慧。如經思維，將片段的知識連貫起來。或觸類旁通，發揮新意，言前人所未言，發前人所未發。或發現自己以前

的見解錯了，進行修正補充，或全部改變。唯有不斷地修正又修正，才能進步更進步。

4. 搜集和整理資料：讀書時可將不同類型的資料，分成專題，一類一類的抄出，將來寫文章時，隨手拈來皆成妙諦。如讀『大毘婆娑論』，可將諸師的資料，分類抄錄，即可以經過整理寫成『大毘婆娑論的諸大論師』、『說一切有部的四大論師』二篇論文。

5. 在通曉漢語的基礎上，應掌握巴、藏、梵文。現代日本學者多在這方面下苦功夫。此外，日、英文也應學。

(四) 道安法師的治學經驗

道安（一九〇八—一九八一）湖南祁陽縣人。一九二六年出家，畢業於南岳佛教研究社，歷任佛學院長、禪寺住持、獅子吼月刊發行人。著有『中國藏經譯印史』、『三論宗史論』等書。他的治學經驗：

1. 訓詁：研究佛學，首先要知文解義。對某一名相，每一文句的訓詁，宜不厭其煩，搜求原籍、異典、互相參證，作多方面的比較，然後抉出正詁，力求避免一家訓詁之曲附或誤解。如天台宗訓詁五蘊義，「受蘊」為前五識。「想蘊」指妄想，即第六意識。「行蘊」即執第八識見分為我，念念不停，即第七識。「識蘊」為別諸識性境，為一切善惡種子所依。這種解釋，號別有新意，但與五蘊的原義不符。

2. 達意：研究某部經論，或某個專題時，佔有大量資料，運用分析、比較、綜合判斷的方法，弄清其根本興趣，發展演變，流傳區域，不偏信一家之言。

3. 研究次第：

① 概論：研究佛學先從概論入手。古人寫的概念論，有『大乘起信論』、『攝大乘論』、『唯識三十論』、『賢首五教儀』、

『教觀綱宗』等書。近人寫的概念論有印順著的『佛法概論』、『唯識學探源』、『性空學探源』、『中觀今論』。木村泰賢著的『原始佛教思想論』、『小乘佛教思想論』、『大乘佛教思想論』。

② 專論：即專攻某一宗派、某部經、律、論，或專攻某一問題，如緣起、因果、涅槃、佛性、眞如等問題。專論屬於一門深入，因此必須懂巴、梵、藏、日、英等語種。如『唯識三十頌釋論』，漢文有眞諦、玄奘兩個譯本，還有藏文譯本，又有近人劉定權及日人寺本婉雅由藏譯漢的譯本，要想攪清一部論書的內容，一定要參讀不同的譯本。

4. 治學態度

① 客觀：凡研究某一宗派、某部經、律、論，某一專題，要佔有大量資料，進行客觀的歷史考證，縝密思辨，分方面比較、分析、歸納，切忌主觀臆斷。

② 虛心：在研究時要虛心，不戴任何有色眼鏡，或主觀偏見。

③ 成果要有時代氣息：寫出文章，要用時代語言，與現代思潮融合。力求文理淺顯通俗易懂，普及大眾，深入社會各階層。

④ 加強對社會科學、文學藝術、宗教學的研究，辨其同異，取其所長。

(五) 木村泰賢的治學經驗

木村泰賢，日本東京帝大教授，是著名學者宇井伯壽、高楠順次郎的學生，一九一四年與高楠順次郎合著『印度哲學宗教史』蜚聲學壇。木村曾輔佐高楠完成『大正藏』的編纂，他的著作有：『印度六派哲學』、『阿毘達磨論的研究』、『原始佛教思

想論』、『小乘佛教思想論』、『大乘佛教思想論』、『解脫之道』。其治學經驗：

1. 語言和知識上的準備

① 語言上準備：漢語、藏語（藏語經典中、含有原典及漢譯中散失不傳的經論甚多。藏文佛典多為直譯，其學術價值與漢文同樣重要），梵、巴、美、德等語種都要掌握。

② 知識上準備：佛教是宗教，必須懂一般的宗教學，宗教原理，宗教史。對宗教發生、發展、演變的規律，有所了解。如佛教教理與印度婆羅門教，耆那教共同之處甚多，不懂印度宗教史，何者是佛教特有的思想，何者是印度宗教共同的思想，就攪不清楚，往往會把異教的東西，當成佛教特有。佛教又具有印度哲學思想的內容，必須懂些哲學史方面的知識，即將哲學的態度和論理的方法，應用於佛教哲學研究領域。佛教是一種古老的文化，與歷史學關係密切，必須具備歷史知識，才能以史學研究的方法，確定三藏聖典和大乘佛經成立的年代。此外、處理經文，鑒定文物，考證人物等等，都需要豐富的歷史知識。

2. 佛教研究三大部門

① 佛教史的研究：佛教史可分為佛教史和佛教思想史。佛教史著重研究佛教與政治、經濟、民族、文化藝術、社會事業等方面的關係。佛學思想史研究，最重要的是正本清源，弄清原始佛教或根本佛教的主要內容。明乎此，對以後佛教發展的綫路，就容易理順。

② 對佛教教理的研究：佛教教理的研究現狀，只停留在對古典經論註解的水平上，是沒有什麼出路的。要引進現代治學方法，從事佛教心理學、倫理學、社會學、宗教學各個領域的研究。也要加強對宿命論、意志決定論、自力他力論、懺悔論、迷悟論、救濟論、教儀學等專題進行研究。在研究過程中要注意對佛學

思想的淨化。衆所週知，任何外來思想都有糟粕與精華兩部份。棄其糟粕，存其精華，是研究者的任務所在。表達形式，以現代語言爲佳。

③ 對教務工作實際的研究：如對僧團組織的改革，佛教團體與個人所經營的社會事業。如何將『法華經·普門品』觀音三十二應說，展開爲從事社會上各個行業活動的菩薩行。如何將淨土三經說的西方極樂淨土的模型移植到人間，建設人間淨土，這是佛教徒光榮的歷史任務。

（六）牧田諦亮的治學經驗

牧田諦亮，日本京都大學教授，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，著有『中國近代佛教史研究』、『五代宗教史研究』、『中國佛教史研究之一』、梁、唐、宋『高僧傳索引』等書。他的治學經驗：

1. 研究學問：一、要有興趣，二、要有恒心。牧田從一九三零至一九四零年的十年間，一直從冢本善隆、羽田亨學習中國文學、哲學佛學。

2. 共同研究：這是近四十年來日本學術界一種新型的研方法。由望月信亨、冢本善隆、牧田諦亮等著名學者所創立。其特點是數人同時對某論題或典籍，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。如『佛教大詞典』、『大藏經索引』、『高僧傳索引』等幾部名著，都是採用共同研究的方法編寫的。

3. 透過現狀，了解過去：研究佛教史，要走出研究室，到與自己研究項目有關的地方進行實地調查，然後再參照文獻，才能避免片面武斷的錯誤。爲此，他曾多次來華訪問，對陝西、江西、浙江、上海、北京、湖北、廣東、西藏、四川等地佛教遺蹟，進行考察，收集了大量資料。近來他又訪問五台山，考查五台山佛教現狀，收集有關文殊信仰資料，並與中國佛教界進行交流。

二、佛學研究的幾個重要原則

前面介紹幾位大師的治學經驗，對我們開展佛學研究有借鑒，但爲了更好地進行佛學研究，還應堅持下面的幾個原則。

1. 要從我國的國情出發，即從我國佛教的實際情況出發來研究。例如原始佛教的戒律規定：比丘不可持有金錢。不可以耕田種植，以免傷害生靈。應該出去乞討食物，維持生命。這就不符合我國的國情，在我國根本行不通。衆所週知，印度文化向來敬信沙門，而且在中部南部一帶，氣候溫和，野生果木很多。乞食不到，還可隨處採集野菜充饑。我國古代重視農業經濟，除了貧苦無靠，淪爲乞丐以外，一般靠乞食過活，會被人們譏爲懶漢或寄生蟲，受到社會的譴責和歧視。因漢魏六朝的佛教寺院，主要靠統治階級的佈施供養和向信徒們募化。唐百丈懷海（七二〇—八一四）不怕別人攻擊爲「破戒比丘」，使佛教與我國封建經濟相協調，斷然提出建立叢林制度，開墾山林農田，以自耕自食爲主，以募化所得爲輔，耕種所獲，和普通平民一樣，按照政府法令政策，納糧定稅，既非特權階級，也不是世外之民。每日勞動，叢林述語叫「普請」，意爲無論上下，普遍參加勞動。方丈和尚須躬先領頭，爲衆表率。百丈禪師到了晚年還堅持勞動，弟子們過意不去，就偷偷地將他的農具藏起來。他因找不到農具，一天沒有幹活，也就一天不肯吃飯。樹立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的禪風，勉勵僧衆，感召後世。既是大衆勞動所得，叢林經濟，一切收支，絕對公開，稱曰「公衆」。當「執事」的，要相信因果，公私分明。不可私自動用常住的一草一木。如寶壽禪師，在五祖寺庫房當執事。住持和尚戒公，因病服藥，需用生薑，令侍者到庫取用，遭到寶壽訓斥。戒公知之，令侍拿錢到庫房去買。後來洞山缺人當住持，郡守請戒公推荐。戒公說：「那個賣生薑的漢子去得」，便有「寶壽生薑辣萬年」的公案。所有的僧衆，白天勞動，晚上參禪，對修行沒有絲毫放鬆。有「常住一粒米，

大如須彌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還」的寶訓，警策人們要將「了道」放在第一位。百丈建立的農禪結合叢林制度，使印度佛教進一步中國化，叢林成了僧衆之家，大家在一起，過着同勞動，共消費，家庭式的集體生活，這是中國封建家族經濟的產物，對中國佛教的穩定和鞏固起了重要作用。假若沒有百丈的改革，照那些「食洋不化」律師們的意見走下去，佛教就會步景教，摩尼教之後塵，很快地就會消失。

再如孝的倫理，在中國社會有絕對的權威。「孝」的具體內容：『孝經』第一章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；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孝之終也。夫孝始於事親，忠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」。又『孝行章』第十三：「孝子之事親也，居則致以敬，養則致以樂，疾則致以憂，喪則致以哀，祭則致以嚴。」佛教出家出世，以方外人自居，超絕於社會，與中國社會孝的倫理發生衝突，遭到儒生的劇烈攻擊。爲了適合中國的這一國情，佛經的翻譯家們，翻譯了大量有關孝道的佛經，更製作了『父母恩重經』，以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。在教理上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。淨土教以孝敬父母，作爲生西方的重要條件之一。在上報四恩中，將報父母恩與報三寶恩並列。說明古代高僧們處心積慮地從我國國情出發，把佛教建立在「孝」的倫理基礎之上，使其能在新的環境裏站穩腳跟。

2. 不搞述而不作，不人云亦云，不迷信權威，不炒冷飯，在理論上要有勇氣。要像司馬遷說的那樣：「窮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。在佛學研究上要敢於成一家之言。昔道生讀法顯譯的『泥洹經』說：「除一闍提（無信的人），皆有佛性」。認爲「稟后二儀，皆有涅槃正因；闍提含生之類，何得獨無佛性，蓋是經來未盡耳，乃唱闍提之人皆得成佛。」時大本曇無讖譯「未傳，孤明先發，舊學僧徒，以爲背經，遂顯大衆，擯而遺之。後大經至，『聖行品』云：「闍提人雖斷善，猶有佛性」

。道生能不迷信經文，力排衆議，提出「闡提人有佛性」的卓見，爲中國僧人在外來文化中，爭得一席之地，實爲難得。至於智顛的五時八教，賢首的五教十玄，慧能的曹溪禪。等而下之，臨濟與德山呵佛罵祖，丹霞燒木佛，南泉斬貓，歸宗斷蛇，婆子燒庵。近代太虛大師提出人生佛教對治在我國流行的神教、鬼教、死後的佛教。這些大師能發前人所未發，言前人所未言，爲中國佛教樹立巍峩的豐碑，奠定了鞏固的基石。

3. 着重理論聯繫實際。過去曾批評理論脫離實際的人爲「教嘴子、禪腿子」。指學教的人多油嘴滑舌，言不及義，不能理論聯繫實際。佛學研究者要聯繫的實際是什麼？應該說是四宏誓願。①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是聯繫衆生的實際，即去造福社會，利益人群方面做了些什麼？做得怎樣？這是學佛者的前提。如果背離了這個原則，不管裝得多麼道貌岸然，也不管說得多麼娓娓動聽，充其量不過是些焦芽敗種而已。②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，是聯繫自己的思想實際。在研究的過程，時時要以遍行、別境、善、煩惱、隨煩惱、不定六位心數，來對照自己，明確當前一念，是什麼性質？如果是煩惱和隨煩惱，則應除惡務盡，斬草除根。也即是神秀大師說的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的意思。③「法門無盡誓願學」是聯繫自己的知識實際。「和尚」一詞，漢譯爲博士或老師，說明和尚是古代的知識份子。印度人把知識份子分爲五大類，即聲明、因明、工巧明、醫方明、內明。做爲一個博士和老師，應通達一切知識。佛經裏說，菩薩於五明處上求佛道。據此可知，只有通曉一切知識的人，才能稱得起佛的稱號。相反，非但愚昧的人不能成佛，就是精通一門知識的人也不能成佛。④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是聯繫自己的遠大理想和抱負。爲了上求佛道，這是佛學研究的目的。一般人把成佛看成是很神秘的事，這是錯誤的。其實成佛一點也不神秘，從釋迦牟尼成佛的內容，順逆觀察十二因緣的實事，充分說明成佛是證悟十二因緣中道妙觀。『般若經』說：「菩薩坐道場時，觀十二因緣不生不

滅，如虛空想不可盡，是爲菩薩不共中道妙觀」。『阿含經』說：「十二緣起，甚深甚深，難見難了，難可通達；而緣起的寂滅性，更難了知，更難通達」。可見成佛的內容，是勘破非性空的實有，非緣有的邪空，不落斷常。除了通達緣起性空的實相之外，豈有他哉！每個佛學研究者，應以四弘誓願爲鏡子，天天照照自己，做得怎樣。看到不足之處，找出差距，明確努力方向，在百尺竿頭上，前進再前進。

4. 加強參訪研究：參訪研究是佛教的優良傳統，悉達多太子出家後，參訪了跋渠、阿羅邏、鬱陀羅，即是向他三人進行參訪研究解脫生死的方法，結果認爲他們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都是錯誤的，達不到預期的效果。印度佛教僧團規定比丘天天過着乞食的生活，乞食的目的是什麼？主要是通過乞食和人民大眾保持着乳水的關係。了解群衆的疾苦，關心羣衆的痛癢，及時爲羣衆排憂解難。佛一生說法，都是針對僧團內和人民大眾中存在的具體問題而說的，從不無病呻吟，空發議論。

佛教傳到中國，歷代僧人，雲游五海，參方行腳的目的：一、爲了參訪名師，從他的言行上，學習一些寶貴的東西。二、爲了認識社會，宏法利生，改造社會。像玄奘、法顯等大師，爲了攪清論、律的理論問題，到印度去求法取經，進行調查研究。還寫出光耀千古的調查報告，如法顯的『佛國記』，玄奘的『大唐西域記』，義淨的『南海寄歸傳』等，爲祖國的文化寶庫增添了光彩。

牧田博士提出研究中國佛教史，要到中國佛教祖庭進行調查，增加感性知識，防止片面，鬧出笑話來，這個辦法很好。如研究天台宗，儘管現在國清寺沒有什麼文物，但是也應到那裏看看，參拜智者大師塔院，欣賞大自然的風光，拍點彩照，印證文獻，也可以寫出幾篇有質量的論文。

(完)